

是凡人，是勇者，有如你我

鲁 敏



我们的生活由什么构成？匮乏，求索，得到或失去，思变；匮乏，求索……这多像一个周而复始的莫比乌斯环：欢乐有时，当你得偿所愿；泪水有时，当你求而不得或得而复失。《此时此刻》是我的第十部长篇小说，正是以“失去”为核心，讨论我们如何面对丧失、如何处置痛苦、如何重建自我与生活。真高兴在茫茫人海中与主人公艾胜春相遇并写下了她，她身上有着时代的性格和气质，也是我当下、从此时此刻中找寻到的那张面孔。

我长篇小说里的面孔，都来自我所在的时空。早些年 的《六人晚餐》，写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厂区，艰难穿过产业转型期的人们。《金色河流》则是瞄准长三角那些热气腾腾、走路咚咚响的小老板，他们身上那种蓬勃的气象，实在是非常地激发我。这种“激发”感，一直都是我创作最基本的一个内在动因。到这部新作，跟以往一样，也是被我身处的外部世界的氛围、气息、凉热、人们的心事与表情所触动。

关于《此时此刻》里人物的来路和去程，我在新书分享会上与读者谈过两张与我相遇的面孔。第一张面孔属于数年前一位当街握着手机痛哭的陌生人，我能从只言片语中听出他正遭遇命运的寒冬，这在

我心里埋下了一个引子。这些人，是与物质快速积累的时代一起奔跑、一起壮大的一代人，身上有着鲜明的成败观，有着集体基因般的努力与爱争爱赢，这种不满足与求上进，是极为朴素也极为有效的进取力量。可换个角度看，他们最擅长也最习惯的经验便是从少变多、从小变大，就是得到并积累，就像一只总是凭借好风上青云的风筝。那么，当生活突然拐弯变速，他们会怎么样？

第二次与面孔的相遇，是在超市门口，两个闲谈的人，用极为平常的口气谈论这几年的难处，带着一种野蛮又柔韧的街头感，让我极为触动。此情此景并不殊异。我有时心里不痛快了到小区楼下巷子转转，总看到有铺子关门倒闭，也有铺子摆起花篮重新开张，有的生意红火，也有的门前萧条，但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天刚放亮就出来忙活，像农民每天伺候土地一般，用一种灵活的微小的“打不死”的方式，每天给自己一点进项。也许敲开任何一家的门，或拉着路上的陌生人交谈，他们可能都经历或正承受着各种起伏跌宕，可他们就这么平常地甚至是自然地带着股子韧劲儿在往前走，相信只要肯卖力气在做事，就总归能慢慢向好——我意识到，如果要雕刻一位定格在此时此刻的人物，当是这样一张走过泥泞、走过创伤、走过低谷而依然强健依然“打不死”的面孔，带着野草般的力量，一种民间气象或街头哲学。可以说，这些街巷上的陌生人，是凡人，亦是英雄，是他们让我有信心来处理当下、处理关于“失去”的主题。

确实，写当下并不容易，因为人们对于此刻的世界有着芜杂多变的理解与看法，不像对于历史或稍远的年代，距离感带来道德上审美上价值观上的相对稳定。可我也在想，正因近在眼前，所有的体感、细节、情绪都是一手的，是我最有

感触也最有激情的——正应当写呀！当下亦是历史的片段，会与所有过往和未来的片段加在一起，构成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就好比说，在奔腾的河流中，努力记录流动的水纹，这是难的，但也是最贴近、最为体恤的。

在繁复的纹路中，我选择了经济的纹路，无它，这是一种折射或者说角度。在与一些学者做新书对谈时，他们谈到巴尔扎克书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谈到美国作家德莱塞笔下的女性，谈到茅盾先生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兴起的关注，也谈到《骆驼祥子》里很详细的经济账，等等。当然，我不敢托大，只是出于一种自不量力的热切，幻想着能通过《六人晚餐》《金色河流》《此时此刻》等来远远地仰望一方天空。

富有味的是，此时此刻的经济生活，正是极具张力的“时刻”。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围绕着艾胜春，我写了她的老乡、同学、闺蜜、恩师、青梅竹马等，写下他们一起走过的共同岁月，这种种，是非常继续非常沉重也非常庄严的社会关系。中国人总是特别讲人情、讲情分、讲情义。当这样一个带着数千年情义血脉的中国人，碰到了商业与经济问题，很难用绝对的资本逻辑去客观处置。所以我总说，这是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故事，同样的事件若发生在其他国度和族群，或者是若干年后的中国，古老情义与现代商业之间，或许就不存在如此的矛盾与博弈，就不存在这样难为人也成就人的张力了。

接着说“失去”。小说中人对失去的处置，是各各不同的，有人愤世嫉俗，有人顺流而下，有人求神拜佛试图参透看破，有人则发生更大的变故。都不容易，我尊重和守护着他们的选择，他们在选择中更改各自的悲欢，也重构着那个内在的自我，有的变得强韧与理性，有

的变得自欺或孱弱，并因此而分岔隔阂或重新相认。比如艾胜春的中年恋人徐展图，二人经过这一段艰难，分分合合中反而重新抵达了对方。又比如开书店的小列托和中介曹爸爸，决定克服怨尤，跟艾胜春一起做事，他们的想法很实际：虽然上一件事败了，但如果搭手做事可以挽回损失，那就干。

毕竟，艾胜春也好，她周围的这些朋友亲人也好，大家都已是走到此时此刻的现代人，他们身后早不是生锈的铆钉或蒸汽火车，云时代与AI大潮带来快速更迭的产业格局，这需要更具现代性的人格，这种现代性是不畏物质的，是创造物质的，更是能够穿过物质并抵达彼此的。萨特曾言：“人，由于命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经历了孤勇与痛苦 的交织碰撞后，艾胜春对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不止是及物的部分，而是更进一步，重建信与爱的秩序——在至暗孤独中，艾胜春更深切地意识到，没有与他人联结的世界，自我便不存在、不成立了。艾胜春领悟到并勇敢地付诸行动，找回了情义与勇气，更长出一种成熟、务实的现代性社会人格。

或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课业：面对失去，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艾胜春后半截的故事，正是我与她在岁月中的共同领悟与讲述，也代表着我们的一种祝福与希冀，在巨大的坚硬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细小不停 的行动，需要持久的柔软的力量，去达成人间的基本善意与普遍维系，并成长壮大为更加强健的自我。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镜”中之象与“针”下之思

——评沈杏培《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

刘名扬



的干扰项；它是研究者进入文本时不可或缺的参照，但若使用不当，也会沦为限制阐释自由的囚笼。这种出于理论辨析与文本实证之间的运思方式，在全书中颇具代表性。

同样彰显方法论自觉的，是作者对当下学术生产中逻辑问题的集中反思。他将一种普遍存在的“强行关联”的研究症候归纳为三种形态：简单并举式的松散关联，其特点是缺少对内在使用机制的追问；虚假关联，即以主观臆断取代实证考辨；庸俗关联，指以机械的方式将复杂的文学品质归结为某种外来渊源或偶然性因素。这一归纳，是对学界习焉不察的“伪逻辑”的清醒反思。作者所强调的，无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纪律：关联研究必须以“有迹可循”为前提，论证的逻辑必须经得起推敲。这种对求真的守护，构成了全书方法论的基石。

如果说上述探讨偏重于批评的“方法”，那么对批评伦理的思考则体现了作者更为宏阔的视野。作者将目光投向批评史的，在法国理论家蒂博代所论的“求疵的批评”传统中，为中国当代批评实践寻找精神资源。作者认为，“寻美”与“求疵”是文学批评不可偏废的两翼，两翼茁壮，方能齐飞。与此同时，作者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自省：任何一种批评方法一旦过分强调排他性，便蕴含着自反的危险。当“求疵”成为唯一尺度时，它所打开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另一种盲视。因此，他提出在审视研究对象时宜存一份“理解之同情”，怒批时怀一份商榷之平和。这种既擎“针”在手、又不忘以“镜”自照的批评伦理，使《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的论述在锋芒与温度之间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平衡。

批评方法的建构最终要落实于对文学现场的有效介入。作者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诊断式”批评能力，穿过文本表层的叙事肌理，探入时代与个体精神状况的深处。他发现并阐释新世纪小说中“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这一命题，彰显了一种将文本细读与哲学思辨熔于一炉的批评品格。沈杏培的批评视野同样贯穿着对文学形式本体的关注。他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空间叙事的考察，提供了理解当代小说形式创新的独特视角。传统小说中，空间往往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与点缀，服膺于时间叙事与主题诉求。而作者注意到，在苏童、余华等人的作品中，空间正从叙事的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制约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乃至生成核心意义的关键力量。这一发现，为理解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稿所收录的一系列作家专论，也展现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书中呈现出的将文献考辨、文本细读与思想史追踪融为一体的治学方法，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路径。

问题意识使这部论著始终保持着“及物”品格，不作凌空蹈虚之论；价值立场则使它的批评充满关怀，拒绝在是非面前含混。《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的学术旨归，在于呼唤一种更为健康、真诚的批评伦理，即让文学研究重获直面时代真问题、守护学术真精神的能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批评前沿



自工业文学诞生以来，始终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是，乡土文学先后出现了多部大型作品集成，而工业文学却长期缺乏一部足以体现其历史分量的文献总集。

这一缺憾，终因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百年工业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得到弥补。《大系》共二十卷，收录1905年至2023年间近千部（篇）工业文学作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文学诸种文类，总字数逾1300万字。它在完整呈现百年工业文学历史面貌的同时，也以其鲜明的学者立场、史家意识与现实品格形成了独特的编纂特色，为其后的工业文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文献基础。

《大系》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它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汇编，而是一部承载团队学术自觉的文献集成。其一，《大系》的编纂植根于团队的学术积淀，团队核心成员均有在相关领域多年深耕的经验。主编贾玉民、樊洛平上世纪末即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首个工业文学研究课题“二十世纪工业文学研究”的任务并著有《二十世纪工业文学史》；史料卷、戏剧卷、报告文学卷的主编李惠敏、田丰是《中国工人文学史》的主要作者；中篇小说卷主编刘宏志长期致力于工业文学话语流变研究；散文卷主编潘磊也长期从事相关研究。这种“先有研究、后有选本”的路径，使得《大系》得以建立在成熟的理论框架与较为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其二，在编纂体例上，《大系》形成“总体史论—分卷导言—具体文本—史料索引”四层架构，既追步1935年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传统，又因涉及时段更长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书总体以文体分类分卷——长篇小说四卷、中篇小说三卷、短篇小说三卷、诗歌一卷、散文一卷、报告文学二卷、戏剧二卷、影视文学二卷——各卷相对独立，每一文类内部均由分卷主编撰写《导言》，梳理该文体内部工业题材的发展脉络、审美特征与历史局限，较好地兼顾了历史叙事的整体性与文体发展的独立性。

在十八卷作品选之外，《大系》专设史论卷与史料卷。史论卷分“概观”与“史论资料选编”两编，系统梳理工业文学的起源、流变、分期、主题内涵与审美特征，为读者从宏观上把握百年工业文学的整体面貌奠定基础；史料卷则设置“大事记”“作家小传”“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书目索引”“报刊作品索引”等板块，对百年工业文学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多维挖掘。两者结合，纲举目张，既完成了对百年工业文学史的系统总结，也以原生态的史料呈现为后续研究开辟了空间。

在作品遴选方面，编者结合工业文学自身特点，秉持“大文学观”及经典性代表性并重的原则，避免了仅以审美标准取舍作品的局限。团队在甄选艺术精湛的工业文学经典之作的同时，也自觉打捞那些生涩乃至粗糙的代表性文本——只要其处在工业文学发展历史链条的关键环节上、内容具备相当的社会容量、便足以与经典作家作品并列入选。这种“历史链条意识”也使《大系》超越了一般选本的精品选录逻辑，承担起文献集成的使命。

检视十八卷作品集，读者可以发现，《大系》既收录了草明《乘风破浪

《中国百年工业文学大系》 为中国工业文学存档

王翠艳

浪》、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文学史公认的经典之作，也收录了散落在旧报刊、地方文献、工厂文艺选集中的文本，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工业文学的地域性与行业性特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散文卷中收录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关于劳工问题的政论文章——这些文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却是理解早期工业文学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充分彰显了编者的史家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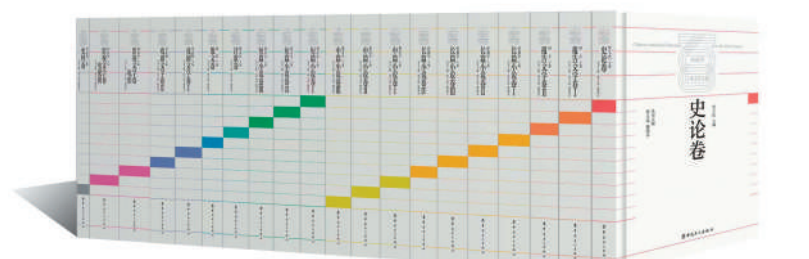
《大系》的史家意识也体现在对工业文学发展规律的提炼与总结上。史论卷及分卷导言并未止步于作品的罗列与介绍，而是深入探讨了工业文学与时代政治、工业生产方式、工人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勾勒出其从自发到自觉、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形态的审美演变轨迹。这使得《大系》兼具“选本”与“通史”的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坐标。

注重学术考辨与版本选择亦是《大系》的重要特色。例如，编者将1905年柳亚子发表的短篇小说《劳动狱》确立为中国工业文学的起点，较之前学界以1913年恽铁樵《工人小史》为发轫之说提前了8年，体现了对工业书写历史开端的重勘。又如，《大系》收录作品以初发表本或初版本为准（个别作品采用距初版最近的通行定本），尽最大努力保存工业文学历史原貌。凡此种种，均显示出《大系》的史家意识。

《大系》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贾玉民曾言：“系统梳理百余年来优秀的工业文学作品，让百年的文学形象为中国工业发展留史，为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奋斗的光辉历程立传”，是其“久蓄于心”的愿望。从百年前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工形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主人翁与建设者，再到市场经济浪潮中的转型者与坚守者，工人形象的百年变迁，均在《大系》中有着直接的体现。

金无足赤，《大系》也不无改进空间。例如史论卷中的“中国百年工业文学史论资料选编”与史料卷均收录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两者各自的选录原则当进一步厘清。瑕不掩瑜，仅凭其将大量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分散文本汇编为系统的文献集成这一点，《大系》便功莫大焉。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校地侨联动——

全国首个县级文化“新三样”研究院成立

本报电（陈婉儿）近日，侨乡青田·浙江传媒学院文化“新三样”国际传播季活动在浙江传媒学院举办。活动期间，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新三样”为聚焦，依托青田侨乡资源禀赋与浙传传媒学科优势，搭建校地侨三方合作模式，成立了青田文化“新三样”研究院。

据悉，这是全国县域层面首个专门以文化“新三样”创作、研究、转化、国际传播为定位的专业研究院。研究院聚焦理论研究、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对外传播四大核心职能，标志着青田文化“出海”从以往零散式、活动式传播，正式迈向体系化研

究、专业化孵化、常态化输出、长效文化传播阶段，为县域深度参与国家文化对外传播战略提供坚实理论与实践支撑。

活动中，网文名家、短剧创作者、影视制片人、高校学者、海外侨领、外籍友人跨界围坐，聚焦“青田文化‘新三样’‘出海’路径”展开探讨。与会者认为，青田的独特优势就是“侨”。遍布全球的侨胞、深耕海外的商贸网络、天然的跨文化交流基因，为文化“新三样”打开了重要的“出海”通道。未来要依托侨乡优势，用短剧、网文等轻量化、共情化、普适性的新型文化载体，助力侨乡故事、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刘心武推出新作《晚风拂柳笛声残》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日，“在时间中凝眸：一个写作者的路路——刘心武《晚风拂柳笛声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作者刘心武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围绕新书展开对谈。

《晚风拂柳笛声残》是刘心武最新散文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三辑，第一辑写人，追忆与亲朋老友交往中的真情；第二辑记事，记述对时代的思考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第三辑谈创作，凝聚作者对文学的见解与苦心。从“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的精神启蒙，到《钟鼓楼》对人文世情的深刻描摹，刘心武的作品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此次推出的散文新作映照出作者半个世纪的文心风骨，可称当代文坛备忘录。

刘心武从散文写作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个人独有的“双面绣”写法：一面绣出自己在时代中的存在感与独特见闻，一面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环境细节，将个人记忆与时代风貌交织。他解释道，“回忆冯牧、茅盾先生以及诸多往事时，一面绣出的是我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如何在场，所见、所闻、所感与内心的波澜；另一面，则在行文中不断嵌入那个时代的细节，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风貌，写出当时具体情境下那些不可多得也不可失去的细节”。

李洱谈到，书中对冯牧、茅盾、林斤澜、茹志鹃等人的回忆，保留了珍贵的文学史细节。李洱注意到，刘心武写作与不同代际作家的交往，“面对老作家、前辈作家，有如侍坐；面对同辈作家，则有执手相看的感觉；与王小波、邱华栋这样的晚辈作家相处，则是温柔敦厚，有垂爱之感”。

陈东捷在总结中说：“从《班主任》到《钟鼓楼》，再到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的文体，刘心武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融会，又一直在坚守，并且一直面向未来。他写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在历史中、在时间中的现实，都是带有感情、直抵命运的现实。”